



## 書 評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840-1911.* By Frank H.H. King.  
(Bombay: Vora & Co., 1968.)

前幾年我曾在學報上介紹過景復朗先生的專著——中國近代貨幣及貨幣政策，1845—1895 (*Money &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845-1895*)，那是一本探討中國近代經濟史上貨幣因素的專題寫作。我提及這件事主要是因為在那本書中，最後一章，景先生曾舉出了有關中國近代化的若干疑題，針對一個主要問題：何以中國在清季未能近代化？他在那本書中所提及的各點和我現在要介紹的他的新著——簡明中國近代經濟史，一八四〇至一九一一——頗有關連。

首先我要說，研究中國經濟史的人，對於一本新的綜合性的著作都會有一觀為快的心理。大家都瞭解到在目前關於中國經濟史的工作，仍在專題研作的階段，尚不可能產生比較全面性的、有體系的「通史」性的著作。無論採用那一種規律：歷史的、經濟學的或社會學的，基本的工作都尚待耐心的去實做。如果沒有這種專撰做基礎，綜合性的概述是很難着手的。但是，任何一種初步工作，對於專業的，以及一般讀者都不失為新鮮而有意義的事。

是書共分爲六章：一、中國經濟史上若干問題。作者列出了三個主要問題。其一，中國近代史分期的問題。其二，中國近代經濟史上統計資料的缺點。其三，中國未能近代化的原因。關於第一個問題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無庸評議。關於第二個問題，十九世紀中期以前，世界各國除少數國家外，統計資料之不完備，有缺憾，似乎是共同的現象。重要的是第三個問題。中國何以未能近代化？照全書內容而言，包括一八四〇至一九六一，則所謂未能近代化者略有語病，嚴格的說，應該說是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未能近代化。一般人都不能否認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已然發生了「突進」(“the great spurt”)，或者是走入「起飛」階段。以是這一問題當指的是過去百多年的事。二、一八四〇至一八九五年間中國之傳統經濟以及西方勢力之沖擊。三、印度與中國——個案研究。四、一八九六至一九三六年間中國經濟近代化之肇端。五、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



年間中國之惡性通貨膨脹。六、經濟主義與不斷革命（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一）。最末一章，經濟主義及不斷革命兩個名辭對於西方讀者說來須加詮釋，似應加上符號：「經濟主義」，「不斷革命」。

本書是以經濟學者的立場，來分析近代中國之經濟變化及發展過程的。作者在自序中有一段話，說出全書主旨所繫，陳義頗高：

“The present work presents a synthesis of the results of recent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economy in as coherent a sequence as possible. The varying emphases as the story moves from one period to another in part reflect the state of research, in part the different economic questions which appear of major interest.”

這種出發點是很值得稱許的。這種總結性的工作，對於治經濟史的人及一般讀者都有裨益。當然隨着研究的進展，總結性的工作是要不時的跟着做的。本此，以觀全書，我們覺得此書有作參考的價值。不過，內容和所標的綜合工作，似乎尚有一段距離。第一，截至一九六八年書出版時止，關於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作，分量頗夥，尤其是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八年間中國經濟之發展，西方撰述極為可觀。本書未能擇要利用。這可從行文及書後所列書目中看出。作者對於中文材料的忽略尤為可惋惜之事。講中國問題而完全抹殺中文材料，是難以自辯的。第二、本書的「綜合」工作，在材料分配上，輕重方面略失之偏。如貨幣一端在本書中所佔的分量過於突出。對於各種因素的比率，缺乏平衡。

本書全文約二百餘頁，篇幅雖不算多，涉及的方面頗廣。茲從簡，謹就下列各端略抒管見，就正於作者：

作者在序言中曾說到這一百多年的中國經濟史，無一一貫的經濟理論可供採用，此為無待申論之事。在第一章中作者先後列舉了幾種理論，加以評述。其中，依管見所及，制度論的觀點最值注意。這不是說全部近代中國經濟史都可以制度理論來解釋。除此以外，自然環境的地理因素亦不容忽視。着重經濟因素，使我們對問題能更確切把握，更作大限度的深入。但以此孤立的因素來探討全部問題，將失之不平衡。中國近代經濟之變化及其發展之滯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內在的，有外在的。如欲在外國經濟史上尋求傍證，作為了解中國情形的借鑑，則一九一七年前前的帝俄，或者十八、十九世紀的法國，最有參考意義。其中基本體系為農業生產方式、生產組織等大端。作者從

行政機構上着眼，以大英帝國和大清帝國作比較是不切實際的。作者討論同、光年間的自強運動時，認為當時反對改革、反對近代化並不足為奇。反對改革、反對近代化，在各國都有前例。自強運動之所以失敗，在於當時沒有經濟的刺激力。這個理論過於單一化了問題之所在。問題是在沒有經濟刺激力時，有無其他代替因素。

作者進而提出公共部門 (public sector) 之中央政府的財政何以不能促進近代化。作者認為癥結在財政之不統一集中，財政收支旁落於地方疆吏之手，中央政府在經濟上失其控制力。清代財政制度之不能在近代化上起領導作用，如十九世紀後期之俄國，可以視為中外經濟發展史上分歧關鍵所繫。「中古」型的財政概念、財務行政、俸餉制度，形成不合實際、不健全的財政制度，不但農民的繳納實數與中央所收的額數大相徑庭，且無餘力、無決定性的政策，注用國庫收入於生產性的投資用途。清廷財力之貧乏，不能全由財權由地方操縱來解釋。何況財政收入也並不是完全為地方所直接管制（本書頁四八）。在大部分時期中至少關、鹽稅缺都是中央直接委派，關鹽收入是向中央報解的。

看了作者列舉、評論的幾種研究方法以後，管見以為更可使我們有一感識。中國近代經濟的變化及發展，如用歷史的多元論來分析，比較體切。格盛克倫 (A. Gerschenkron) 所倡的經濟落後不等 (degree of economic backwardness) 觀點，對十九世紀以來迄今中國之情形，有較大的參證價值。中國自一八四〇以來，迭次受辱於西洋及日本，不能因戰敗而引起統治階層之全力近代化，此其故不能全歸之於單純的經濟因素。政治、種族因素似乎值得重視。俄、日之近代化，動機在藉近代化而獲得近代軍力，以軍事近代化來提高國勢。中國的問題不如此簡純。統治者的滿洲皇權畏變、畏改革、畏近代化。在滿族統治者的心目中，政權的鞏固，首為防漢，其次始為「外夷」。防漢重於防「夷」。而新式工業之起於各省，為地方大員所倡導，中央在保衛政權的基本政策上是畏懼、反對，更談不到積極興創。這和十九世紀後期之俄、日，情形相左。所以近代化在清季不但無西歐工業化過程中之經濟的、政治社會的先備條件，而且無格盛克倫氏所說的代替條件。此所以新式工業興辦數目之少，而又失敗，是邏輯性的必然結果。

管見以為這一百多年的經濟史，專用經濟因素來分析、解釋，而且不作比較長時期的趨勢研究，結果難免於支離破碎，不能窺其全貌。

在結論中，作者引用了Walter Galenson的論斷，將中國與印度相提並論。以西方經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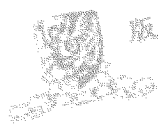
濟學家的立場，評論中國、印度現階段經濟之成長，其持論是否公允洽當，頗有疑問。

最後，對於一般讀者來說，本書所提供的綱領，所附的簡單的書目，有其可取的一面，仍不失為一本可參考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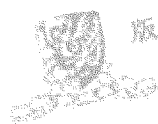
張 德 昌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